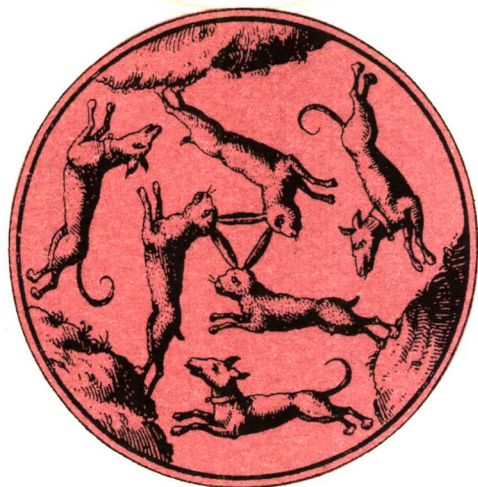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WORLD CLASSICS ON EUR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16~18 世纪中亚 历史地理文献

[乌] Б.А. 艾哈迈多夫 著

陈远光 译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ОРИЕНТАЛИСТИКИ И АЗИАТИК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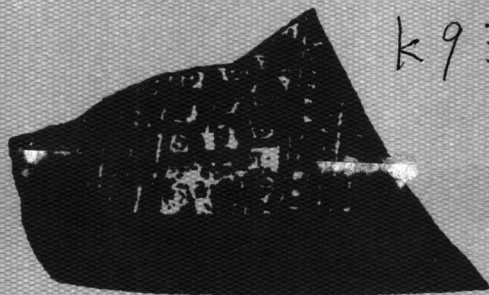
16—18 世纪中亚 历史地理文献

И. А. ШУВАЛОВ

著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WORLD CLASSICS ON EUR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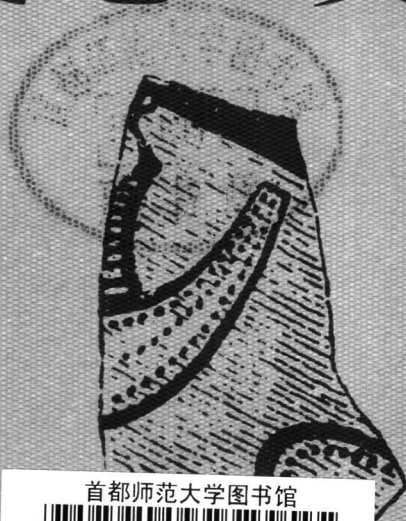


k936.6/1

[乌] Б.А. 艾哈迈多夫 著

陈远光 译

16~18 世纪中亚 历史地理文献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27784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乌]Б.А. 艾哈迈多夫著;陈远光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4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ISBN 7-222-03464-1

I. 1. Ⅱ. ①艾...②陈... Ⅲ. 历史地理—文献—中亚—16~18世纪 IV. K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1889 号

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
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

著者 [乌]Б.А. 艾哈迈多夫

译者 陈远光

总策划 林祥 胡廷武

主编 余太山

副主编 张立

责任编辑 张波

封面设计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版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 1194mm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50 千

印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7-222-03464-1/K·323

定价 45.00 元

出版说明

一、本丛书所谓“欧亚”主要指内陆欧亚(Eurasia),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二、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上有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对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我国作为内陆亚细亚的大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特别是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朝鲜半岛、日本、乃至西欧、北非等地)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尤其是核心地带)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

四、本丛书旨在将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有关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学者。凡属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范畴的通史、专史、研究专著、专题论集或资料集,于我国内陆欧亚学界有重大参考价值者,均在收辑之列。学术性名著是入选本丛书的主要标准。

译者的话

这是一部史科学专著。凡治史者莫不重视史料,所谓“无史料即无历史”之说固然有些偏隘,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俗话说的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说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问题,不通过史料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本书作者艾哈迈多夫先生在前言中特别地引证了恩格斯的这段经典论述,并指出:“中世纪史科学以及任何其他史料性研究之基本和直接的任务,首先在于对历史文献进行挖掘、整理和批判性的研究,而批判性研究的前提是要对史料区别对待,善于从中汲取最全面、最重要的研究资料。”

具体而言,本书系统、全面地介绍、批判、研究了中世纪晚期中亚历史地理文献。

所谓“中世纪晚期”,即本书书名所示的“16~18世纪”。本书所介绍的历史地理文献大体上产生于这一时期,只有个别文献,如《沙哈鲁编年史》超出了这一时段。这些文献大体上也是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但有的也不完全限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如一些通史性著作(《历史精粹》、《传记之友》、《艾布·海尔汗史》、《史记精选》等)从远古,主要是从“穆斯林王朝”创世述起,但一般地说,所有这些关于16世纪以前“穆斯林王朝”历史的追述,只是编撰、甚至照搬阿拉伯史家的著作,既不是这些文献的最重要的内容,也不是其史料价值之所在。

本书作者艾哈迈多夫先生生于1924年,历史学博士,教授,科学院院士,是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乌兹别克斯坦学者。苏联学术界传统意义上的“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指的是今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即阿姆河和喷赤河右岸及整个锡尔河流域。然而历史上的中亚大体上是个人文地理概念,似不宜以现代国家今天的国界来限定。因此这本书所介绍历史文献所涉及的地域,除了苏俄学者所定义的“中亚”外,还包括了月即别地区(今哈萨克草原、南俄草原),呼罗珊、巴达克山地区(今伊朗、阿富汗北部的喷赤河左岸),克什米尔地区(今印度、巴基斯坦北部),朵豁刺惕(今中国新疆南部)等地。

治史者都以为治中亚史难,首先就难在史料这一关。中亚是古代几大文明连接、中间地带,对于古代几大文明区而言,都是个遥远的边缘地带,因此外界对它知之不多。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研究中世纪以前的中亚史有自己的便利条件,这就是我们还拥有相对丰富、准确的有关中亚史的汉文资料。汉、唐、元时期,中国的中央政权在中亚有广泛的影响,因此自司马迁著《史记·大宛列传》到其后诸正史中的“西域传”,以及使者、僧人的旅行记,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便是中亚古代历史、地理、民族资料中的珍奇。但是本书所论及的16~18世纪,即我国的明清之际,正是中国的中央政权对中亚影响最薄弱的时期。明初永乐年间陈诚数次出使西域,最远达帖木儿朝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所著《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是研究那个时代中亚史的珍贵资料。但是自陈诚以后至清乾隆中期三百多年间,中国中央王朝的使臣再没有步入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因此汉文文献中缺少这一时期中亚方面的准确信息。乾隆三十七年(1772)成书的《西域闻见录》,始有关于中亚地区的广泛论述。但清代著名史家魏源认真阅读后得出的结论是:“此录于葱岭以西各国,道听途说,十伪六七,不可依据”(《圣武记》卷四)。

中世纪以前中亚本土文字资料本来就十分匮乏,所使用的文字如粟特文、吐火罗文、佉卢文、古突厥文,都已成为几乎无人识读的死文字。然而,随着阿拉伯的扩张、伊斯兰教传入,用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察合台文)撰写的“穆斯林文献”开始大量涌现,16~18世纪正是这类历史文献鼎盛时期。毫无疑问,这类史料成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最基本史料。本书作者艾哈迈多夫这样规定自己工作的宗旨:“在本书中,我们力求科学地运用16~18世纪我们认为最为珍贵的记述性史料,通过16~19世纪初在中亚和中亚以外的伊朗、阿富汗、北印度所写的波斯文和突厥文著作,展示这些史料中丰富多彩的部分。”这一时期,包括俄国人在内的西方人也开始进入中亚探险、考察,因此作者在精选大量“穆斯林文献”的同时,也收录了一些西方旅行者的笔记、回忆资料,总共五十部,可谓洋洋大观。我们注意到,其中《拉失德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新疆社会科学院原民族研究所组织翻译,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我国学者浓厚兴趣,且在自己的研究中频繁引用。近年王治来先生又将《巴布尔回忆录》译出,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但迄今为止,也只有这两部重要著作译成汉文。其中还有一小部分抄本在国外以真迹复制的方式出版,但广大研究者,特别是不谙波斯文、察合台文的读者还是难以利用。从这一点来看,艾哈迈多夫先生的这部专著,应是有志于研究这段历史的学人搜集基本史料的向导,也是从事中亚和新疆历史研究学者的案头必备之工具书。

这本书分上下编。上编介绍本土的历史、地理文献37种,下编介绍回忆录和外国旅行记13种。在介绍每种文献时大体包括有书名、作者、写作时间、体裁、基本内容提要、特点、史料价值、抄本收藏地及具体编号、刊本、译本的版本等。其中包含对有关问题的考证、勘误,与同类文件书的对比,对其价值的分析、评估,显示作者非凡功力和学识。该书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指出。

一、有关这些文献的作者和写作年代的考证和研究

由于这些文献都是几个世纪以前的抄本,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有的还需要认真考证。比如开篇介绍的第一部文献《史选·胜利记》,艾哈迈多夫先生从该书的内容,以内证的方式排除了列尔赫、穆克米诺娃、谢苗诺夫、尤金、阿克拉莫夫等学者的意见,谨慎地提出:“该书是昔班尼汗身边的一位学者遵照其旨意撰写的”。一般而言,这些文献的作者都是那个时代的文人学者,其身份多是宫廷文人、汗王幕僚、达官亲信。然而还有几类人值得注意。一是作者本人就是汗王、贵族、重臣。如《突厥人世系》的作者是希瓦汗国的著名汗王;《拉失德史》的作者米尔扎·海达尔是朵豁刺惕部的显贵、叶尔羌汗国的重臣;而他的姨表兄,著有《巴布尔回忆录》的巴布尔,是帖木儿王朝的王子,在北印度延续数百年的莫卧儿王朝的开国君主。正因为这些作者本人就是当时重大事件的决策者或积极参与者,所以无论他们怎样描述和评价这些事件,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研究价值。二是小官吏。如《纳迪尔济世史》、《汗的礼品》的作者,前者是军械库的管理员,后者是汗王图书馆管理员。尽管他们地位卑下,但仍追求词藻的华丽,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最高统治者的阿谀奉承,同时又因为他们不处在政权的上层,观察的视野又不同于后者,能为我们展示当时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鲜明画卷。三是外国旅行家:英国商务代理兼外交官安东尼·詹金森,俄国外交官霍赫洛夫,帕祖欣兄弟,别涅维尼,还有一位俄国主教赫里桑夫,他是出生于威尼斯的希腊族人。其中有的是负有搜集重大军事政治情报使命的,如帕祖欣兄弟受莫斯科政府的训令之一是:“要想方设法搞清楚:现在布哈拉、乌尔根奇和巴里黑国王与土耳其速檀、波斯沙、印度国王和格鲁吉亚的关系如何,与谁友好,与谁不和,现在谁掌握乌尔根奇的权力,布哈拉、乌尔根奇和巴里黑的军队有多强大,国库是否充实?”

因此,这些西方人的报告在内容、视角、风格,特别是在写作目

的上完全有异于本土文献。

作者的身份、地位,决定文献的内容和体裁。在本土文献中,政治史、编年史占有较大比重,如《史选·胜利记》为王朝史,《穆克木汗史》、《克普恰克汗史》、《汗的礼品》为汗国史,《列王世系》为国家关系史,《胜利颂》为韵文体编年史。其次是传记,如《昔班尼传》是由昔班尼“钦定”的汗王传,《完美精神集》是伊斯兰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大毛拉马哈杜姆·阿扎姆的生平传记,《天堂花园和侍从之林》是伊斯兰朱伊巴尔系霍加们的合传。著名的《巴布尔回忆录》既是回忆录又是著者自传。除此之外还有天文、地理、百科类文献,如《七气候带》、《奇迹集锦》、《土地等级奇迹》、《珍奇之地》;伦理类,如《王诫》;文选类,如《友人纪要》、《穆特里比文选》。有的是洋洋数十万言鸿篇巨作,如《巴布尔回忆录》、《拉失德史》,有的则是残篇断简,如《乌兹别克九十二部名》、《乌兹别克人世系》,特别是后者,残存仅两页纸,却是记录乌兹别克诸部落的珍贵资料。

正是由于文献的作者形形色色、体裁多种多样,所提供的信息就十分广泛、丰富和各具代表性。

二、关注民族史、宗教史资料

中亚地区民族迁徙频繁、民族进程复杂,16~18世纪,正是近代意义上的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民族形成、发展时期。然而,直至十月革命时期,甚至连俄国学者都弄不清楚其中最普通的情况。很长时期,俄国学者把哈萨克人称为吉尔吉斯人,成立苏联时的吉尔吉斯共和国直到1925年才改为哈萨克共和国,而“卡拉吉尔吉斯”才恢复自己正确的名称——吉尔吉斯。如前所述,本书在介绍《乌兹别克人世系》时详细提供了这九十二部的名称,它们是:

明格、尤孜、克尔克、乌兹别克、温卡扎特、贾拉伊尔、
萨赖、孔格勒、阿尔钦、阿儿浑、克布恰克、乃蛮、恰克马
克、阿扎克、卡尔马克、塔尔雷克、图达克、布尔拉克、萨马

尔奇克、克普恰克、克列奇、基纳卡什、布伊拉克、乌拉特、乞雅、契丹、通克里、乌兹茹劳奇、科伊奇、乌塔吉、布拉特奇、吉尤特、贾特、奇尔丘特、布夫毛特、维毛特、阿尔拉特、克列惕、温库特、唐兀惕、曼格特、恰尔丘武特、梅西特、蔑儿乞惕、布尔库特、乞颜、库尔斯、乌卡兰、卡雷、阿拉伯、伊拉奇、茹布尔干、季什雷克、克赖、土库曼、杜尔曼、塔宾、塔马、拉马丹、穆伊坦、卫逊、巴代伊、哈菲兹、吉尔吉斯、马扎尔、库恰里克、萨乌兰、巴阿邻、维里斯、茹布拉特、比代、鞑靼、塔巴什、米奇克尔、连勒都思、秃八、季拉夫、基尔达尔、比克季亚、卡尔肯、希林、奥格兰、库拉拉特、巴格兰、钦拜、切希尔卡斯、畏兀儿、阿加尔、亚布、塔尔格尔、土尔加克和科哈特。

在另一份抄本《乌兹别克九十二部名》中也记录了与此大同小异的资料。我在论文《关于乌兹别克九十二部名》(《民族研究》1988年第4期)上便利用了这两份资料。我认为,这确实是探讨乌兹别克族源和部落演变的重要材料,极为宝贵。艾哈迈多夫先生在介绍本土各文献时,还不遗余力地搜集了其中有关各民族部落的资料,介绍了它们在各抄本中的页码,为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详实、可靠的线索。

16~18世纪是伊斯兰教在中亚大发展的时期,其时教派林立,大毛拉、大依禅辈出,伊斯兰神学学术流派蜂起,本书介绍本土文献时也十分注意这方面的丰富资料。艾哈迈多夫先生并不把毛拉的传记看成纯粹的神学书籍,他认为“诚然在这些传记中,宣扬宗教意识与讲述历史生活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认真研究表明,其中也有极其珍贵的有关劳动人民状况(如不堪重负的赋税和徭役、汗和官吏们的贪污受贿),封建土地所有制,粮食和其他食品的价格,水利,宗教封建主的大量财产及其管理办法,城市生活等方面的实际资料,这是记述性史料中所缺乏的。”(前言)在评介这些文

献时,艾哈迈多夫先生都认真地给予全面介绍。

三、传达给读者有关社会生活、社会习俗的有价值的新东西

艾哈迈多夫先生强调本书的重点“放在揭示史料内容,说明我们认为对当今科研工作有价值的新东西,特别是能够消除中世纪晚期中亚诸民族历史研究中的漏洞、不准确和不清楚的东西。我们力求最充分地反映有关劳动群众的状况(赋税和徭役、封建上层镇压劳动群众的事实、封建上层的贪污受贿、人民运动),封建制度(伊克塔、苏尤尔加勒、坦哈赫),大规模可耕地,中亚诸汗国的国家制度(主要是关于官品、称号及其社会地位的资料),水利情况,中亚城市状况,年表和世系,中亚诸汗国与伊朗、印度、俄国、中国新疆的政治和贸易关系”。(前言)16~18世纪中亚地区人祸天灾接连不断,这在当时的本土文献中时有记述,艾哈迈多夫先生对此格外关注,如在介绍《乌兹别克诸王录》时引证道:

饥荒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人肉成了人们[惟一的]

食物。死了的人不埋,都被吃了。(134页)

艾哈迈多夫先生还特别引录了《王诫》一书中1689年大旱的严酷景象:

泉眼都干了,似凶残贪婪的人的眼睛。[仅有的]几滴雨水,像是从母亲乳房里挤出的一点奶汁,落到干裂的地上。大河里的水如同无依无靠人的一只手,有气无力,再不能伸向远方……由于酷热,地里的庄稼成了干柴杆,被觉察不到的风带走了。(80页)

如果说这是天灾的话,那么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则更令人发指。艾哈迈多夫先生在介绍《史记精选》时还注意到这么一条史料,说的是巴布尔与克孜尔巴什攻陷卡尔希时说:“当圣战勇士用武力占领[任何一个]地方时,都要把这个地方的居民斩草除根,[这样做时]是不分什么赛义德不赛义德的。”克孜尔巴什兵士们听了这个号令后,冲进清真寺,把赛义德们的头一个一个割下来。“圣战”“宗教

斗争”的本质由此昭然若揭。

细节描述是文学作品魅力之所在,在历史文献中则是历史真实再现的生动体现。以往我们只模糊地了解到当时中亚汗王登基时举行用白毛毡抬起新汗王的仪式。艾哈迈多夫先生在介绍《汗的礼品》中首次详细地披露了这一仪式的细节:

回历 1170 年 3 月 23 日(公元 1756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一,仆人们在典礼大厅铺上地毯,摆上宝座,星相家确定登基的时辰,然后邀请异密、达官和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头面人物(四姓代表:马哈杜姆·阿扎姆·卡萨尼、赛义德·阿塔·霍加穆罕默德·伊斯拉姆·朱伊巴里和霍加阿赫拉尔的后裔)入场。在星相家确定的时辰,由宫廷霍加、贴身仆人、侍卫将蒙着双眼的穆罕默德·拉希姆领进大厅,让他坐在一块白毡子上,两头由四个主要部族的代表,即曼格特部(穆罕默德·达尼亚尔比)、乌塔奇部(霍贾姆亚尔比)、巴赫林部(盖布拉比)和萨赖部(贾汉吉尔比)的代表拉着,而毡子两边由上述四姓代表伊斯哈克霍加、阿明霍加、艾尤布霍加、沙哈布·丁霍加和从显赫的达德哈、土克萨布、萨德尔、热伊斯及武官中推举的几个人拉着。随后才把新汗放到宝座上,于是宴会和赠礼开始。凡是参加庆典的人,汗都要赏一件贵重的长袍。异密、达官和穆斯林神职人员的代表在星期一和星期三都要去朝拜新汗,只有到星期五发表呼图白时才提穆罕默德·拉希姆的名字。汗国所有主要城市和村镇都要铸造有他名字的钱币。32 个大部族的代表人物都要按其民团总人数和功劳封官。

这就是 1756 年穆罕默德·拉希姆在布哈拉登基的一幕。而从事 18 世纪中亚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者也会从本书中了解到感兴趣的丰富资料。如书中记述的职业匠人有:缝制匠、铜匠、压花匠、厨师、指

甲花染料匠、鞋匠、马具匠、织布匠、打猎手套缝制匠、名贵丝绸衣服裁缝、金丝刺绣匠、制针匠、雕刻匠、镶金匠、首饰匠、皮革匠、制帽匠、织毯匠、铸币匠、铜模匠、染布匠、装订匠、装饰师、镀金匠、铁匠、建亭匠、卖肉匠、棉布匠、布匹商、香料商、刻章匠、宝石匠人等等。其种类之繁多、分工之细、手工业之发达,可见一斑。

许多文献,既是历史文献,又是地理文献,其中包括许多那个时代的山川、河流、城市的可贵记录。如《突厥人世系》谈到:

那时从乌尔根奇到艾布汉,如从一个阿吾勒到另一个阿吾勒一样,因为当时阿姆河流经乌尔根奇城下后,便向艾布汗山东面流去,在山脚折向西流,流到奥古尔恰后,从那里流入马赞达兰海(今里海)……在回历 986 年(1578)哈吉姆汗当政时,阿姆河在哈斯米纳拉城的上游卡拉艾格尔的灌木丛中冲出一条新河道,绕过土克城堡,改变了原有河道。

这是中亚最大的河流阿姆河从流入里海改道入咸海的历史记录,非常有价值。一些文献中记载了当地的名胜古迹,如宫殿、行宫、大清真寺、德尔维什修道院、圣徒麻札、宗教学校、古城堡、大澡堂、园林、天文台的建筑样式、结构、修建年代等,也是很有史料价值的。如《土地等级奇迹》一书以赞叹的口吻描述巴里黑城外的霍加艾布·纳斯尔·帕尔斯麻札:

方圆约有 15 杰里布。在它的西面有两座大清真寺。每逢星期三,在晌礼结束后,麻札附近就会聚集一群前来朝拜的贤士、苏菲、学者和诗人。苏菲们垂首[相互]低声交谈,学者们在争论,诗人们吵吵嚷嚷地赛诗。就这样一直持续到黄昏。

军事史学家一定会对文献中记载的军队组织,作战队形,战术,兵器(除长矛、弓箭、马刀外,还有圆锤、石弩、喷火器、云梯、火绳炮、铳铁炮等),战利品分配等情况感兴趣。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当时行

军打仗时已有军事“口令”，如问“塔什干”，就回答“赛拉姆”，以区别敌我。至于关于“穆西卡”和“十二木卡姆”的记载，一定会引起音乐、舞蹈史研究学者的关注。

以上所举的只是这本书展示的丰富资料中的东鳞西爪。艾哈迈多夫先生奉献给学术界的这本书，堪称有关这一时期史料之海的高度浓缩，从事有关研究的学者无论从什么角度去阅读它，都会满载而归。

只要略略翻检艾哈迈多夫先生的这部著作，各种各样的陌生人名、地名、部族名、王朝名、宗教和社会生活的专门术语便扑面而来，再加上极其复杂、陌生的人文历史背景，构成了翻译过程中没完没了的难关。因此，译者费时十余年，方将全书译出，奉献给广大读者。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按照一般翻译史书原则，有关专有名词不宜盲目译音，如 Гуйук-хан，万不可按译音表译作圭乌克汗，而应对译作贵由汗。但此话说得容易，完全做到太难。如本书中大量出现的 Уэбек，似应区别对待，针对具体语言时代分别译成月即别或乌兹别克，因为在 16 世纪以前，Уэбек 指的是里海、咸海一带的游牧月即别人，其中包括许多突厥、蒙古部落。1500 年游牧月即别人一支由昔班尼汗率领南下河中，以后逐渐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近代意义上的乌兹别克人，而滞留在草原上的游牧人则大部分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哈萨克人。而本书所举的文献正是跨在这一民族演变时刻，它所使用的 Уэбек，究竟应对译成月即别，还是乌兹别克，实在难以一一辨析。像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翻译过程中也只能大部分按音译处理。好在原书附有关于人名、地名、部族名的索引，读者可以很方便地查到俄文原文，并根据上下文和自己的专业理解做出自己的判断、取舍。

潘志平 陈远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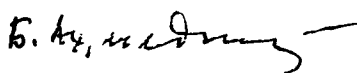
2000.3.10

中文版序

本书在塔什干用俄文出版,至今已有十几年了。这本书是我多年对昔班尼王朝(1500~1601)和阿斯特拉罕王朝(1601~1758)统治时期,有关中亚民族历史、文化的波斯语和突厥语史籍研究的结晶。它受到美国、蒙古、阿富汗、捷克斯洛伐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他国家学者的好评。

现在我高兴地获悉,在伟大的中国也知道有《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并将由陈远光先生翻译后用中文出版。

我完全赞同本书译者陈远光先生的看法,在中国用中文出版本书将有助于中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中亚的历史,有助于加深中国人民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民之间的友谊。而众所周知,中乌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



Б.А. 艾哈迈多夫

1995年11月8日

前 言

苏联历史编纂学在中亚诸民族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迄今为止,对中世纪晚期的研究也做了不少工作。^①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封建关系进一步加深,大封建主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性加强,从而导致了分裂和封建割据的发展,以及国家中央权力机构权力的削弱。但是,缺乏研究和研究得不深入的问题还不少。这些问题涉及社会经济关系、人民运动的特点和实质、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民族形成过程等。其原因是对分散在苏联和其他国家许多抄本库中的大量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刊布工作还很落后。没有这些文献,没有这些文献中丰富的实际资料,就不能指望对上述问题以及其他历史问题做出科学的解答。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写道:“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②因此,不一定有必要去专门讨论历史文献对研究国家和民族许多世纪前历史的意义。我要指出的仅仅是,如果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初期保存下来的文字资料很少,考古发现、碑文和其他文物对这些时期历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的话,那么对研究中世纪的历史来说,历史文献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们最充分地反映出了远离我们几百年,但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封建社会的生活。由此可见,中世纪史科学以及任何其他史料性研究之基本和直接的任务,首先在于对历史文献进行挖掘、整理和批判性的研究,而批判性研究的前提是要对史料区别对待,善于从中汲